

孫詒讓研究

孫詒讓研究

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究室

1963年·杭州

类号	96.1
卷号	10932

編輯者 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究室

印刷者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 內部發行 *

定價：壹元

96
10

表所述楊伯郎歷官頗多其詳多
 等湯固志疑為士女篇所未及可互相
 校補至其往弟穎伯則常志并與其
 名作猶此其梗概尤其實也表云
 伯郎三為尚書常志止云一為尚書
 不云三任故御覽職官部引益部
 省舊傳云太尉李固屬楊淮案
 世服事李固次固練為典且有
 征用至北機密持拜尚書固
 表先作尚書令陳蕃表行此後
 徵為尚書此中即再為尚書之事
 其三為尚書則新覽引者舊傳
 亦無其文不案本何時表云表
 以同郡下至子計以憲平二年二月
 廿日為詳以此進勅銘於表
 伯郎即時之受爵時表較略之詞
 結釋派陰本有伯克廟解之味
 伯祖禮所止位與此同常字誤謂
 時與德表通用是也而伯為伯則
 何朱其位伯則以家世清德為
 孝子世陳仲舉所屬又言伯

其冀林林在者忠及莫歸家
 孫則不亡事蓋亦忠健清亮之
 士蓋平中元二正堂禁嚴屬
 時固望極忠忠賢聯看究解
 乞收休三兄中玉以表以渴渴楊
 伯郎同郡之敬乃伯郎表廷蓋
 猶中官之賢者表在臨李之
 江亞興 第四子之福其
 據顧炯世元自初中寄素
 箋為書表作中年多病年
 累之表與此以應也偶成其
 咳小同族西中得前十年
 而小除司錄錄尉楊休表
 伯郎錄錄小表
 叔休修如多之表
 大能一表也時元伯原子二月
 廿日中宋弟孫伯德書於
 伯郎表

《漢司隸校尉楊淮表紀跋》手稿



玉 海 樓

引 言

瑞安孫詒讓(1848—1908)是清代末葉的經學、文字學和校勘攷據的著名學者。近代浙江學人，俞樾以後，黃以周、孫詒讓、章炳麟最爲卓偉，而章炳麟以爲孫詒讓的成就又過於俞氏、黃氏。

孫氏之學，承乾、嘉以來經術訓詁的方法，廣泛地使用於先秦古籍的發掘校理；而又運用新的資料，開闢了新的途徑，上推語言、制度、曆象之原。治學範圍之廣，致力之深，清朝一代學者少有可以比並的。他的《周禮正義》籠取漢代以來的《周官》學說，而爲之理董發正，被認爲清代最後也最爲精贍之作；《墨子閒詁》集中了百年間的校勘發明，給沈薤已久的哲學典籍作了整理發揮，對後來的古代思想研究工作有不小影響。而孫氏對於甲骨、彝器刻辭的探討詮釋，在近五十年來文字學、攷古學的發展中尤其有啓導恢張之功。章炳麟說他的學問“三百年絕等雙”，誠然不是過譽。今年距孫氏誕生已一百十五周年，距《墨子閒詁》、《周禮正義》的成書也已六七十年了。從科學的歷史主義觀點，對孫氏的著作重新加以探索，批判地接受其中的精華，使之能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工作所資取利用，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孫詒讓的學術成就和影響，固然值得今天的重視，但他的治學觀點和方法，總不能不爲他所處的時代和階級立場所局限。孫氏所處的時代，是我國開始由封建社會轉變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時代，國內民主勢力和封建勢力、外國殖民主義勢力正進行着激烈的鬭爭；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已到了“日中則昃”的境地，今文學派乘時崛起，並且直接地干預當時的政治變革。孫氏由於時代激流和學術思潮的影響，表現了某些進步傾向，而他的經世致用的學術觀點，却是反動的，遠遠地離開了他的時代的，是企圖爲自己的仕宦地主階級服務的。他的反動階級立場也決定了他對當時蓬勃興起的農民

起義運動的敵視態度。作爲一個歷史人物，正確認識孫氏的政治面貌，將有助於對他的學術遺產作出正確評價和有效的闡發。

目前，對於這樣一位在近代學術界有重要地位的樸學大師的研究工作，還有待於進一步深入開展。這本集子裏所收的論文，只是試圖就孫氏的著述和思想作若干方面的探討和記述，提出作者自己的意見。孫氏玉海樓藏書和手校、手稿本大部分已歸杭州大學圖書館收藏，正在輯錄整理。這裏刊出了幾種遺著，爲研究孫氏的學術提供了部分的資料。

在編輯過程中，得到各地學者的支持和幫助，謹致誠摯的謝意，並希望多提寶貴的意見。

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究室

目 錄

引言·····	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究室
孫詒讓與中國近代語文學·····	周予同 胡奇光 (1)
名原校證序·····	劉 節 (12)
名原述評·····	朱芳圃 (15)
讀周禮正義·····	洪 誠 (21)
孫詒讓周禮學管窺·····	沈文倬 (37)
墨子閒詁跋·····	陳奇猷 (54)
稽高白虎通德論校文題記·····	任銘善 (58)
經微室商子校本跋·····	蔣禮鴻 (62)
讀四庫簡明目錄批注與溫州經籍志·····	張 峯 (69)
孫詒讓的政治思想述評·····	沈鏡如 (72)
略論孫詒讓的教育活動和教育思想·····	金燦軒 (88)
孫詒讓先生遺著	
諷箴餘錄·····	雪 克點校 (93)
廣韻姓氏刊誤·····	雪 克點校 (98)
儀禮注疏校記·····	雪 克輯錄 (112)
家語校記·····	孔鏡清輯錄 (127)
檀廩碎金·····	張金泉 郭在貽輯錄 (137)

孫詒讓與中國近代語文學

周予同 胡奇光

在近代語文學史上，承前啓後，有“開新造大”貢獻的，當推孫詒讓（仲容）先生了。^①

（一）

我們先從孫先生的語文觀點來着手分析。他的語文觀點顯然是我國語文學說發展鏈條上的一個重要環節。

我國語文研究的指導思想，從周秦以來，已經經歷了多次變革：最初，東漢許慎主張以字形爲依據闡明本義；其次，清朝戴震、王念孫主張以聲韻爲關鍵進行名物訓詁；^②到了孫先生，提出從文字演變史實中推求文字源流的主張。以字形爲依據闡明本義的主張，基於語言是字的語言、詞的語言這一認識；以聲韻爲關鍵進行名物訓詁的主張，基於語言是有聲語言的理解；從文字演變史實中推求文字源流的主張，基於語文是歷史發展產物的觀點。孫先生實繼承了許慎、戴、王之學而加以發揚光大。

孫先生在1904年看到劉鶚《鐵雲藏龜》以後，就說：“今就所通者，略事甄述，用補有商一代書名之佚，兼以尋究倉後籀前文字流變之迹。”^③次年，他更立志“以商、周文字展轉變易之迹，上推書契之初軌。”^④這就是從文字演變史實中推求文字源流的主張。它的要點：

（一）比較正確地論證了文字的起源。

說明文字起源，必須對‘名’與‘實’的問題有正確的瞭解。名與實的問題，實質上就是語文、思維同客觀現實的關係問題。在名與實的問題上，孫先生堅持《墨經》的觀點，他說：“名爲實之文也。”并引《墨經》“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爲證。^⑤

有了“名爲實之文”的觀點，就不難闡明文字起源於圖畫的道理。首先，他從古字考釋上推求，根據甲骨文、金文“从火字都作”的事實，參證《考工記》“畫績之事火以圜。”鄭注云：“形如半環然”的解釋，而提出“文字權輿，出於圖畫”的命題。^⑥

其次，從古代經籍、字書來證實。他說：

《說文》序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此依漢時尚書家文。朋（案：朋，疑爲服字之誤。）十二章，亦原始象形文字也。（案：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凡十二章。說見《尚書·皋陶謨》。）今篆文，唯日、月、品，原文尙可見。金文又有作山、龍、藻諸形者，或皆其遺象。近儒考定黻文亦罔。（案：金文亞，阮元定爲古文黻。）古文字與畫績同原，此其義證矣。^⑦

最後，從圖畫文字到象形文字發展過程來說明。他將象形字分爲原始象形字、省變象

形字與後定象形字三個過程。

蓋書契權輿，本於圖象。其初制，必如今所傳巴比倫、埃及古石刻文，畫成其物，全如作績：此“原始象形字”也。其形奇詭，不便書寫，又不能翻若畫一，於是省易之。或改文就質，斂其匡郭；或刪餘成簡，稍寫大意；或舉偏略全，略規一體：此“省變象形字”也。最後整齊之，以就篆引之體，而後文字之與績畫，其界乃截然別異：此“後定象形字”。今《說文》所載，大略如是。^⑧

南宋鄭樵曾說過“書與畫同出。畫取形，書取象；畫取多，書取少。凡象形者，皆可畫也。”^⑨ 這個論點，到孫先生才由“假說”變成了“科學”。此後，文字起源於圖畫的判斷，代替了文字起源於八卦、結繩的臆測，使中國文字起源研究邁進了一大步。

（二）初步探索了文字發展的規律。

這可分兩部分說。首先，從文字構成質素來講，孫先生堅持荀子的“沿故名，制新名”的觀點，說“王者之興，必有所因於故名，亦必有所作於新名。”而且又同意許慎的“先有文後有字”的主張，引證他“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的話。他將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揭示了“新故相襲，變易孳益”^⑩的原則，便正確地說明了文字裏新、舊質素之間的繼承性和變換性的統一，從而反映了文字數目從少到多的發展大勢。

其次，從文字形態結構來講，孫先生似乎混淆了“文字數目的多少”和“文字形態結構的繁簡”的界綫；而在文字形態結構，又似乎未能分析“筆畫姿態”和“結構方式”兩個不同方面。如他說：

書契初興，形必至簡。（案：指結構方式。）逮其後，品物衆而情僞滋，簡將不周於用，則增益分析而漸繁。（案：指數目。）其最後，文極而敝，苟趣急就，則彌務渥多，故復減損而反諸簡。（案：指筆畫姿態。）^⑪

蓋倉沮制字之初，爲數尙尠。（案：指數目。）凡形名之屬未有專字者，則依其聲義於其文旁沾注以明之，（案：指結構方式。）其後遞相沿襲，遂成正字。此孳乳浸多之所由來也。（案：指數目。文字結構方式從簡到繁影響到數目從少到多。）^⑫

從數目看，文字從少到多是不言而喻的。但從形態看，就有“結構方式從簡到繁”和“筆畫姿態從繁到簡”的矛盾運動現象。文字，一方面要使用方便，這要求筆畫姿態從繁到簡，因為文字是標指語言的書寫工具；一方面又要音義明確，這同結構方式從簡到繁密切聯系，也因為文字是標指語言的書寫工具。文字形態上從繁到簡和從簡到繁的矛盾，在文字的社會使用的過程中統一起來，也正是文字的社會使用的本性決定從繁到簡在其形態演變中居主導地位，而從文字形體上隸書楷體代替古文篆字後，從豐富字數方法近代採取“複合詞法”代替古代“加偏旁法”後，更鞏固了文字形態從繁到簡這一基本傾向。

同“從文字演變史實中探求文字源流”的主張相關的，是孫先生的文字和語言相互關係的見解。這一見解，必須特加注意，因為這是他解決古文獻考釋中的理論基礎。孫先生在1892年《尚書駢枝序》裏比較集中地表述了這一見解。它的要點：

（一）精闢地闡明了“文字與語言相互依存”的關係。

他堅持東漢王充的“夫文由語也”，“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語同趣”^⑬的觀點，他說：

自文字肇興，而遷古語言得著於竹帛。彙字而成語，彙語而成辭。馳騁其辭，錯綜連屬以成文。文辭與語言固相傳以立者也。^⑭

據我們看來，“文辭與語言固相傳以立者也”這個命題是完全正確的。在語言與文字的關係上，就其出現程序說，當然語言在先；但就其歷史作用看，却以文字為重。語言、文字，本非一物，而“合則雙美”。文字所標指的有聲實體是語言；語言賴以傳達的書面形態是文字。語言因文字而“記久明遠”；文字本語言而“喻意傳情”。語言和文字在社會運用過程中統一起來，相互依存，共同發展，同為人類社會最重要的交際工具。

(二)揭示了語文內部中“雅”、“質”的區別。

唐、虞典謨，簡而易通；商、周命誥，繇而難讀。是豈如後世揚雄、樊宗師之倫故為艱深以難學子哉！亦其辭有雅、質，區以別耳！^⑮

語文內部雅、質區分的原因，他以為是由於使用語文的人的生活歷程、文化水平、生活環境不同的關係。

• 語言則童蒙簡而成人繇，蠢愚樸而智慧文，野鄙質而都邑雅。夫文辭亦然：有常也，有雅也；或簡而徑，或繇而曲，不可以一耑盡也。^⑯

他由此引申出“典雅語文”與“質樸語文”的不同特點：

常語恆畸於質，期於辭約旨明而已。雅辭則詭名奧誼，必式古訓，而僞先民，（案：入字《稽纂述林》作“不越厥宗”。）其體遂判然若溝畛之不可復合矣！^⑰

因此，他認為，要使統治階級子弟在語文上達到有思想、有文采的要求，就要讓他們有文化教養。這在《周禮》注疏中也透露了一斑：

言語答應，比於詩樂，所以達意旨、遠鄙倍也。^⑱

“達意旨，遠鄙倍”，就是孫先生語文修養的標準。這也是儒家“辭達而已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⑲思想的總括。

(三)劃清了語文發展史上“古”、“今”的界綫。

《論語》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禮三朝記·小辨篇》：“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是知雅言主文，不可以通於俗；雅訓觀‘古’，不可以概於今。^⑳

就語文所反映的內容說，無疑地具有鮮明的、確定的時代性。語文也確像鏡子一樣能反映當時實際生活特點的。因此，他說：“文言雅辭，非淹貫故訓，不能通其讀。”^㉑另一方面，就語文的外表形態說，也不能一成不變的。“秦漢文籍，誼旨奧博，字例、文例，多與後世殊異。”^㉒因而校讀古書，就要注意“三代文字之通段，…秦、漢篆隸之變遷，…魏、晉真草之輾淆，…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宋、元、明校槧之屢改。”^㉓

可見，語文在同一民族的不同歷史時期內，有其不同的內容；而且隨時代的發展，語文的形式結構必自有其歷史演變的現象。

總之，孫先生的語文觀點雖然還沒有完整的體系形態，但往往有三言兩語極為精闢的見解。不了解他的語文關係的學說，就不可能深刻地理解他的訓詁學上的成就；不了解他的從文字演變史實中推求文字源流的主張，也不可能很好地理解他在古文字學上的貢獻及其局限。

(二)

明瞭了孫先生的語文觀點，我們才可以進一步研究他在我國語文學史上的地位。

概括地說，晚清語文學界的主要成就是：“語文運動”、“經子訓詁”和“古文字學”都開闢了新境界。其中經子訓詁和古文字學的成績，是跟孫詒讓的名字連在一起的；至於對當時風起雲湧的語文運動，孫先生却比較地疏遠些，但也仍是多少受點影響。

(甲) 從晚清語文運動來看

先就孫先生對晚清語文運動的關係這一點來談。

晚清語文運動的一面大旗幟是“言文合一”。“言文合一”實際上有兩層意思：一種是指“書面語”與“口頭語”相一致，這是當時白話文運動的原則；一種是指文字制度與拼切語音要求相符合，這是當時漢字改革者的主張。而兩者的目的却是一個，那就是普及教育。這一運動是植根於當時經濟上的發展和政治上的變法的時代要求。

從白話文運動看，孫先生並未置身於其中；但在理論上，他的“文辭與語言固相傳以立者也”的思想，却同當時白話文運動的主要精神相距並不遠。當 1898 年裘廷梁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一文中提出“崇白話而廢文言”的口號，1899 年陳榮袞在《論報章宜改用淺說》一文中喊出“夫文言之禍亡中國，其一端矣！”的呼聲，④孫先生除了 1892 年在《尚書駢枝序》裏對“揚雄、樊宗師之倫故作艱深以難學子”提些意見外，以後就再也沒有表示什麼態度了！

再從漢字改革運動看。在當時，“切音”和“簡化”，都是漢字改革運動的組成部分。在孫先生所有著作中，文字考釋談得很起勁，但對改革漢字制度以適應拼切語音的要求，却隻字未提。而他的從妹夫宋恕却是近代第一個在 1891 年就提出“造切音文字多種，以便幼學”⑤（《六齋卑議》）的人！在音切運動上，孫先生並不感興趣；但在簡化問題上，他却有明確的見解。因為他既然具有文字發展變化的觀點，又有“積久承用，皆為科律”的看法，便自然會正確地斷言：

若欲盡以篆繩隸，則其聲不能無扞格。如𠂔𠂔等字，若必從篆文，則不能成波磔，必如𠂔后之以○代日，以丌代天。書之既苦不易，觀之亦復不類：斯亦必窮之道也。⑥

在晚清語文運動的高潮中，出現了我國第一部系統的文法書——《馬氏文通》。馬建忠用西洋文法的框框硬套漢語的事實，固然是錯誤的；但他給文法以一個完整體系的形式，在當時，還是一新耳目的。孫先生雖沒有形成什麼文法體系，但也多少還具有文法觀

念的。例如：阮元將“蔑歷”兩字釋爲羶沒、密勿、黽勉，孫先生却從銅器上看到“蔑曆兩字連文者固多，然間有作蔑某曆者”的事實，因之他說：“凡古書雙聲疊均連語文字，並以兩字連屬爲文，不以它字參廁其間。”他斷言“蔑曆”不是連綿詞，而解釋爲：“蔑，勞也。曆卽歷之籍字；歷，行也。凡云某蔑曆者，猶言某勞亏行也；云王蔑某曆者，猶言王勞某之行也。”^⑧

在晚清語文運動中，孫先生的表現似乎沒有什麼；但他在經子訓詁和古文字學上的成績却光芒萬丈！

（乙）從經子訓詁上看

在清代樸學中，孫先生是最後一位大師。這只要摸一摸他的訓詁名著《周禮正義》、《墨子閒詁》，也會使人肅然起敬，自會要說聲：“得此後殿，清學有光矣！”^⑨

現在偏重於語文研究方法原則這一角度來分析。

（一）繼承戴震、王念孫之學的孫先生，自然也堅持以聲韻爲關鍵進行名物訓詁的主張，這實際上也正是漢語漢字“義本於音”的觀點。

孫先生認爲清代樸學超軼唐宋的一個主要原因是：

大氏以舊業精校爲據依而究其數指，通其大例，精摭博約，不參成見。其誕正文字譌舛，或求之於本書，或旁證之它籍，及援引之類書，而以聲類通轉爲之鎔鑪，故能發疑正讀，奄若合符。^⑩

在此，他正確論述了使用“以音求義法”的前提條件；但同時，他還明確地指出濫用“以音求義法”的流弊：“及其蔽也，則或穿穴形聲，摭摭新異，馮臆改易，以是爲非。”^⑪

誇大點說，清代樸學的最高成就恐怕就是“不拘形體，以音求義”這個原則的發現吧！孫先生不僅從理論上發展了戴、王的主張，而且在具體研究上，也表現了顯著的成效。孫先生之所以能將一部二千多年一直埋藏在道藏裏的《墨子》重見天日、公之於世，其主要原因就在於：“非精究形聲通段之原，無由通其讀也！”^⑫

試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墨子·經說上》：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

王引之云：當作“故言也者，出諸口，能之民者也。”“出”字誤倒在下，“能”下又挽一字。“能”與“而”通。謂言出諸口而加之民也。《繫辭傳》曰：“言出乎身，加乎民。”

（孫詒讓）案：王說移易太多，似未塙。竊疑“口能”，卽謂口之所能，猶《經上》云：“言，口之利也。”“民”當爲“名”之誤。後又云：“聲出口，俱有名。”“出名”，亦謂言出而有名，猶《經》云：“出舉也。”^⑬

當然，“能”與“而”古通，但在這裏，王引之濫用以音求義法，竟陷於“馮臆改易，以是爲非”；而孫先生以爲“民當爲名之誤”，却體現了“以聲類通轉爲之鎔鑪”的思想。

在聲韻學方面，孫先生似乎並不十分內行，因之，不可諱言的，也影響了他的訓詁著作的質量。例如對《釋名》的校釋，就不免有“穿穴形聲，摭摭新異”的缺點。《釋名》一書是用聲訓來求語源的。聲訓只有在一定範圍內，即在同一詞族的字裏，是可以運用的；但《釋名》却把聲訓作爲尋求語源的一般原則，到處濫用，那就經常錯誤。孫先生用盡了考據手

法，勉強解釋“露，慮也，覆慮物也。”“扶，鐵也，其處皮薰黑色如鐵也。”“紉，桑也，如桑葉初生之色也。”等等，這顯然是不對的。^③

(二)孫先生申明了從古義釋古經、用古字校古書的原則，這實際是建立在語文代變、古今不同的認識基礎上的，也就是漢字“義寓乎形”的觀點。

他在《周禮正義·略例》中，批評宋、元刻本所以錯亂原書面貌，是因為不懂得“經文多有古字，注則多以今字易之；《考工記》字例與五官又不盡同”^④的緣故。另一方面，他深知一定時代的語文非反映一定時代的內容不可，因此，他對最古的注釋，諸如“古周禮說”，賈逵、馬融、干寶三家佚詁之類，“無論與鄭異同，竝為擲拾”，而對於宋、元諸儒說，即使有所擷擇，也只是“百一而已”。^⑤將這兩方面合起來，可拼為一句話，便是“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⑥而他的《墨子閒詁》正是用這個原則來發現奇字、解釋古義的。例如：

《耕柱篇》：夏后啓……是使翁難維乙卜於白若之龜。

孫先生便有一段很精采的校釋：

“翁”，當作“菴”。《說文·口部》：“噎”，籀文作“菴”經典或段為“益”字。”《漢書·百官公卿表》“菴作朕虞”是也。“菴”與“翁”形近。《節葬下篇》“哭泣不秩聲噎。”“噎”亦誤作“翁”，是其證。“難”當為“斲”。《備穴篇》：“剗以金為斲”。“斲”今本亦譌“難”。又《經說上篇》“斲指”、“斲脯”，“斲”並作“難”，皆形近譌易。“斲”與“斲”音義同。……“乙”當作“巳”，“巳”與“以”同。言啓使伯益殺雉以繫龜而卜也。《玉海》所引“雉”字尚未譌。今本又挽“雉”字，遂以“翁難乙”為人姓名。真郢書燕說，不可究詰矣！^⑦

(三)孫先生提出了難讀古典參互比較以求良詁的辦法。這顯然是建立在語文內部雅、質區別而雅辭又具“詭名奧誼不越厥宗”的特點這一理解上。

他說：

唐、虞典謨，簡而易通；商、周命誥，餘而難讀。……唯《詩》亦然：《國風》，方語也，故易通；《雅》《頌》，雅辭也，則難讀。故命誥之辭與《雅》《頌》多同。^⑧

因此，對付難讀的古典便有辦法了。他指出：

《大誥》云：“天棐忱辭”。文邛奧衍。證以《蕩》云：“天生蒸民，其命匪謚。”《大明》云：“天難諶斯。”則昭若發蒙矣。（案：孫云：“棐”當為“匪”之假借。）《康誥》云：“汝惟小子，乃服惟宏。”旨亦簡晦。證以《民勞》云：“戎雖小子，而式宏大。”則弇若合符矣。（案：鄭箋云：宏，廣也。）《大雅·思齊》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鄭皆未得其義。證以《康誥》云：“不汝瑕殄。”則渙然冰釋矣。^⑨

王國維就用這一方法去解釋《詩》、《書》成語、《爾雅》中草木蟲魚鳥獸的，發明古語之處也甚多。^⑩

難怪章炳麟贊嘆地說：“詒讓治六藝，旁理墨氏，其精博足以摩擬姬漢，三百年絕等雙矣！”^⑪

(丙) 從古文字學上看

在古文字學上，孫先生爲金文研究開闢了新途徑；而於甲骨文考釋，則更有首創之功。他在古文字學研究的總方向上，大致如唐蘭所說：

溯其本原，本其流變，湮晦者發明之，譌誤者校正之，合之可以徵社會之演化，析之可以考一字之歷史。^④

孫先生堅持從文字演變史實中探求文字源流的主張，其可靠材料和研究方法是：

今略撫金文、龜甲文、石鼓文、貴州紅巖古刻，與《說文》古籍互相勘校，揭其歧異，以著消變之原，而會畧比屬，以尋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⑤

這包括下列三方面的內容：

(一) 倡言對歷代銘文比較勘正，以考求文字歷史。

孫先生健在的時候，還只能看到甲骨文的拓本《鐵雲藏龜》，接觸到的也只是卜辭片段，又多譌缺。並且孫先生究竟還缺乏系統而精深的語言文字學的理論修養，主要是還未完全弄清文字結構規律，沒有看到從字形上考求字源和從語音上探求詞源的相互促進關係。因此，他雖有考求文字源流的美好願望，到底受時代的局限，還不能完滿地實現。他的名著《名原》，不免還有疵瑕，但畢竟是闢山之作，而且其中《古章原象》、《象形原始》兩章有不少考釋正確之處。例如：

晶，《說文·晶部》：“晶，精光也，从三日。壘，从晶，生聲。一曰象形，从○，古○復注中，故與日同。古文作壘，或省作星。”今考“晶”即“星”本字，象其小而衆，原始象形當作晶。《說文》壘亦从晶。金文《梁上官鼎》壘分字省作晶是也。後人增益作壘，遂生分別耳。^⑥

(二) 孫先生有意識地用金文、甲骨文證經典，用經典證金文、甲骨文，確已做到“湮晦者發明之，譌誤者校正之”的境界。

從他古文字考釋中，很明顯地看到，他所用的“分析”、“綜合”方法，經常是以經典爲憑據的。例如：

眚……竊謂此非“相”字，乃“省”字也。《說文·目部》：“眚，从目，生聲。”……此下从橫目形，上从卩者，即“生”之省。猶“靜”从青聲，《說文·丹部》：“青，从丹，生聲。”金文或作眚。(毛公鼎)……金文更有作眚者，又省卩爲中，蓋亦一字。又古字“眚”與“省”通。凡金文云“眚”者，義多爲“省”之段借。竊疑其作眚者，或即“省”之異文。《說文·眉部》：“眚，視也，从眚省，从中。”二字聲義本相近，固可互通也。《春秋莊二十年經》“肆大眚”，《公羊》“眚”作“省”。《周禮·大司徒》眚禮，鄭注“眚”作“省”。《釋名·釋天》云：“眚，省也。”竝其證。(案：上爲分析。)……如《南宮鼎》：“王令中先眚南或。”謂先省視南國也。《宗周鐘》：“王肇通眚文武疆土。”謂王巡省文武之疆土也。以上二文與《易·復·象辭》“后不省方”，及《詩·大雅·常武》：“省此徐土。”義竝合。此竝巡行省視之義。《詩》鄭箋云：“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是也。(案：上爲綜合。)^⑦

同時，他的“證經”、“說字”之學也往往拿金文、甲骨文的考釋來補訂^⑧。例如：